

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13)—— 高等學校教育--自由與自治

美國St. Louis大學及Glennon樞機主教兒童醫學中心小兒科 朱真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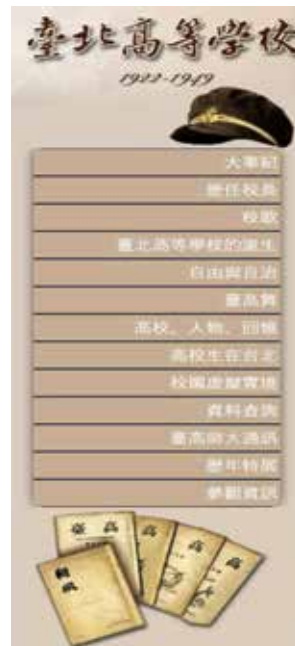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這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系列，回顧醫學院畢業後，各種學術研究及臨床的訓練後，在St. Louis大學小兒科服務。因為主任突然逝世，放棄實驗室研究，有些真業餘時間，開始探討台灣歷史文化，以及醫學人文。兩年多前開始寫這「副/福」業系列，回顧及補新以前的探討，有關這系列的討論，請看幾期前的拙文及文後列出的參考文獻¹⁻⁴。

上幾期討論提到，在日據時代後期，中學畢業若不想考進，醫學專門學校或大學的醫專部，而是想進大學程度的醫科大學或大學醫學部，之前必須先考上高等學校或大學豫科（日語用詞，豫=預）^{3,4}。舊制高等學校/豫科制度，雖早已廢止，日本仍有不少人，一再提倡恢復舊制高等學校教育制度。上兩期先討論日本的官方/校方對高等教育的方針³，上期再討論高等學校學生，熱誠閱讀及學習的精神⁴。這期來繼續討論，舊制高等學校，不管是台灣人或日本人畢業生，都很自傲的「自由與自治」。

學術、思想與生活自由

台北高等學校的網站《臺北高等學校1922-1949》的目錄中⁵（圖一），有一章就是「自由與自治」。網站這章有三節的討論：〈社團〉、〈學寮的生活〉及〈敝衣破帽的天之驕子〉，主要討論當時學生生活上的「自由與自治」。不過網站上還有其他不少資訊，譬如五期的《臺高師大通訊》及六次的《歷年特展》，內有不少有關自由與自治，包括思想及學術自由的討論。



圖一 台灣師範大學設立的《臺北高等學校網站》的目錄，以及台北高等學校的白線帽（上），及學校刊物《臺高》封面（下）。

上述《臺北高等學校1922-1949》的網站，在95周年特展的介紹中⁵，就以《學養與自治精神的傳承》為主題，內有一章就討論〈自由自治的天之驕子〉，就說台北高等學校是「殖民地之下的自由學園----不僅學風自由奔放，臺北高校畢業生在近代的國家發展中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，因而台日籍畢業生不約而同地形容，臺北高校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一股清流」。

在徐聖凱的論文⁶，有一章〈殖民地的自由學園〉，內有一節討論學寮內以及生活上的「自由」與學生的「自治」，可是另外三倍多的篇幅，討論學校的自由校風，包括學術及思想上的自由。台北高等學校是日本戰前，唯

二之一的殖民地高等學校，另一在關東州的旅順高等學校，設立於1940年，時間很短，幾乎沒有的文獻資料可參考，韓國沒有舊制高等學校，京城大學有豫科。大學豫科跟高等學校的教育很類似，不過畢業後，要選擇上的大學有限制，只能選擇設立豫科的那大學的大學部^{3,4}。

上期討論時說過，日本全國的高等學校的教育雖很類似，但是思想及學術自由的開放，可能是各高校之間，最有不同程度的差別。第一高等學校（圖二），是第一個成立的高等學校名校，有高度的自由學風，而且歷史悠久，這最自由的名聲很響亮，畢業於第一高校的陳炯暉教授，就很以此「自由傳統」為傲，討論很多⁷。殖民地的台北高等學校的自由學風又如何？是否相當於日本本土的高等學校？下面的討論主要源自台灣人的高等學校校友的回憶，也請看最後〈結語〉第二段，非校友的觀點。



圖二 第一高等學校（舊制第一高等學校本館；1935年建）



圖三 三澤糾校長。

台北高等學校，是殖民地的學校，仍能被稱為「自由學園」⁶，的確是很難能可貴。台北高校畢業生也很自豪，譬如葉英堃教授就說⁸，在最後的戰爭期間，軍事訓練的及軍教官的囂張下，學生們仍為了要保持高等學校的自由傳統，刻意地「違抗社會規範、挑戰傳統」，這就是高等學校畢業校友最引以為榮的精神。

雖然自由與自治是日本高等學校的特徵，高等學校的自由學風，可能各校較不一樣，更不是「與生俱來」的，每個學校還是要努力去爭取，高程度的「自由」。要去爭取者，不只是學生，校方的官員（教員及職員），尤其是學校最高首長的校長，在殖民地的台灣，可能校方尤其校長的立場最重要。

台北高等學校的「自由」校風，跟第二任校長三澤糾教授（圖三）最有關，他可說為台北高等學校建立相當高度的自由校風。有關

三澤校長的文獻不少，除了徐聖凱的論文內⁶，有不少的討論。津田勤子有一長文（用中文），更有不少分析及討論⁹。對此有興趣，此文外，上搜尋網站如Google，用「三澤糾」去搜尋，有不少資訊，討論他如何爭取高度自由，這是三澤校長對台北高等學校的大貢獻。

台北高等學校主要由三澤糾校長，建立相當高程度的自由學風，由於校長常換人，每位校長作風不一樣，自由程度還是會改變，尤其軍國主義漸盛行後，1930年代初期開始，自由的風氣就開始漸漸被侵蝕，尤其到1940年代，戰爭局勢漸漸不利，軍官擔任教職的教官，管理較嚴格而且囂張，學校的軍事化訓練，自由思想以及自由化生活漸漸改觀，軍訓增加，修業期間縮短。雖然台北高校的師生，為了要保持自由開放的傳統，都特別努力地想違抗，甚至挑戰，但還是漸漸失去自由的傳統。下面的罷課事件，就是一個例證。

罷課事件

罷課事件是三澤校長離開後發生的事件，對以後台北高等學校有不少的影響，尤其對高等學校的自由作風。這件事發生於1930年9-10月，事件主導及主要參與者，都是日本人學生，可能因為台灣人學生，明知熱烈參與，尤其主導者身份的後果，會跟日本人學生不一樣，處罰可能會更厲害。不過在罷課期間，當全體日本學生罷課，台灣學生一樣響應，同樣地固守學寮內沒去上課。可能因為台灣人學生沒有參與主導，中文文獻很少討論這罷課事

件，所以這裏主要依據徐聖凱的論文⁶。

事件開始於1930年9月，因一名學生因考試翻書，被認為作弊遭退學，這學生是野（棒）球隊重要選手，而且就要到日本比賽，學生陳情校方但被駁回，同時另一學生用筆名購買香菸而遭退學。學生認為校方未調查清楚就處分，對學生不公平。學生有些要求，但校長下村虎六郎（圖四）及老師們開會後，拒絕學生的要求，學生們因此發起罷課抗議。學生閉鎖學寮，高等科學生全體不去上課來抗議，尋常科學生沒參與罷課活動。

校方一再地跟學生協調，可是沒辦法解決罷課問題，警務部也去調查，因未查出有左翼團體滲透，本不願干涉。可是幾天後，校方說動警務部，打算包圍學寮。有一名教師到學寮，破窗而入，叫學生在警務部未來前快走。學生離開到校庭高唱校歌，然後步出校門，大呼台北高校萬歲後解散。



圖四 罷課事件時的第三任校長：下村虎六郎教授。

以後對包括台北帝大的不少高校畢業校友們，及一些其他單位的調解方案，校方都沒採取，而且公布懲處辦法，有19名學生停學及3名退學。可是後來這些學生，不久都復學並畢業，而且都領到畢業證書，看來懲處是否只是表面化，而是留有後步的折衷懲處辦法。後來上述到學寮破窗而入的老師，以及三澤糾時代的自由派教師兩位因此去職，下村校長隔年也辭職，回日本。

罷課事件受日本高校的影響

上述的台北高校的罷課事件，可能受日本國內的罷課風潮的影響。徐聖凱的論文⁶，就提到一位台北高校的學生的說法，全日本的高等學校有28所左右，就曾發動罷課活動，這樣仍不掀起罷課的話，就面子掛不住。看起來，類似上期曾討論過的“Peer Pressure”的問題，因全國高等學校，幾乎都有罷課事件，可能影響了台北高校的學生，發起了這罷課事件。

日本本土高等學校的罷課，早早變成一種風潮，或可說是高等學校，學生們很自傲的「自由與自治」精神的延伸。這類的抗議活動，是一種「反體制」的抗爭。因為網路上能找到的中文文獻很少，這裡的資訊幾乎都來自徐聖凱的論文⁶。只想說明，戰前日據時代，雖然不是民主政治體制，追求自由，仍是當時高等學校師生的重要理想。

這種反體制的活動，在日本本土內的大學及高校，很早就風行。這些活動常有左翼團體

參與，左翼團體進入各高等學校，包括台北高校。上面提到警方，很早就懷疑罷課事件，有否由左翼學生所煽動的。罷課事件發生後，警方的調查並未發覺由左翼學生主導，所以警方本不想介入罷課事件，任由校方處理，認定這只是較單純的反體制事件。

罷課事件對以後學生活動影響

第二年，可能還是跟罷課事件有關，下村校長辭職，回去日本本土^{6,10}。他後來以筆名下村湖人，寫了不少文學作品，是相當有名的文學家。網站上還說他具有自由主義與反戰的思路，是少數敢批評日本軍國主義的學者，而且反戰思想散見他的著作中¹⁰。

順便一提，維基百科說¹⁰，在1925年下村就來台，擔任台中一中校長，在其任內的1927年5月，曾發生稱為「炊事事件」的罷課事件。比較上述台北高等學校的學生，較嚴厲地處罰台中一中的台灣籍學生。

徐聖凱的論文⁶，還說這次的罷課事件，更有另一很有趣的影響。可能由於媒體的報導，罷課事件可能影響了校風，學生反因此更自我約束，減少較散漫的自由活動，不再有早期「無控制」的自由。說台北高校的「自由與自治」的基本精神，並沒有因此而改變。看來這罷課事件，還是引導校風轉變的重要事件，學校的自由風氣仍舊維持，可能因為學生較有「自律」精神，而且台灣的社會逐漸改變，漸漸接受高校生的活動。

學生的自治精神

「自由與開放」不能過分，幸而高校生有「自治」精神。「自治」是自己管理，當然學生更要先有「自律」。其實就是軍事化還未盛行前，較早期學生，上兩期討論的蠻風作風時，陳五福醫師就認為，帶點虛假做作的意味，他自己沒有如此做。雖然這類校風，是自由與開放的表態，但生活若太散漫，有些學生反而很喜歡，反而有「過度」的散漫生活，譬如喜歡喝酒及出入風月場所，以致怠惰到影響學業，有些學生甚至被退學¹¹。

很高興陳五福醫師，特別提不能有「過度」的自由及散漫，很重要地，更要有「自律」及「自治」精神。高等學校的校友回憶，很少人提到這類散漫生活的負面影響。陳五福醫師認為蠻風行為，只是暫且發泄情緒而已，「終究了無意義」。陳五福醫師不參加蠻風活動，反而因此常找書來閱讀，書看多了學習更多，更有意義^{11,12}。

先要能「自律」，學生的「自治」才能行得通。高等學校學生，有自己管理的「自治」作風。自由與開放過度及散漫的學生，也由學生自己來管理。上面提到的第一高等學校，學生宿舍生的活規律，都是由學生自己制定規則，選出不同委員來管理不同事物。假如學生風紀有問題，也由學生自己處理，按照自己所訂立的規則，陳炯暉的文中⁷，還提到學生的管理風紀者，有權利命令，出問題者必須退出宿舍，一旦被退出宿舍這，就相當於退學。

結語

因為主要靠徐聖凱的論文，以及台灣醫界人士的回憶，對高等學校文獻的缺乏，無法較深入地探討，所以只能寫出較膚淺的討論。知道前輩們，在高等學校時，有熱誠學習以及自由與自治的精神。這幾篇拙文，很少提到非高校畢業生對高等學校教育的討論。

到Google去用「日據時代高等學校的自由」來搜尋時，很有趣地，得到一寫明是AI Overview的說明：「日治時期高等學校（包含後來的國立臺灣大學前身臺北帝國大學）的『自由』主要體現在學術研究與對外擴張上，但受限於殖民地的本質，學生在思想與個人層面並無真正的自由」。

閱讀時，看到幾乎每位畢業校友，都討論不少學生時代的「蠻風」及「ストーム (Storm)」，而且幾乎都給予相當正面的描述。這種蠻風及ストーム的精神，跟這兩期討論的熱誠學習、自由與自治精神是否有關？是否有因果關係？讀的文獻很少，沒看到有人特別討論這點，以後有機會再多找些文獻來探討。

兩期前曾討論³，這種蠻風、奇裝異服或惡作劇等作風，早期的台灣社會及媒體也有不少批評，漸漸地也被保守的台灣社會接受。不過現在的民主社會，可能不一樣。那時代的警察對高校生的寬容，最好的例子，可從傅彩勳前輩的一文〈台北高等學校的生涯〉看出來⁷。他有次深夜喝醉酒倒在路邊，被警察拘

捕，像一名罪犯審問，警察後來看到他高校生的帽子，講了幾句話後釋放他。社會人民有不同等的待遇，不是現代民主社會可容許的吧！日本政府當年可以，現在大概也不敢如此。

以上諸期探討日據時代的高等學校教育，雖然因自己能力有限，不能深入，不過對當時高等學校教育頗為羨慕，以後有機會再來另文寫些感觸，尤其想跟自己醫預科時代比較，如何可學習前輩們的熱誠閱讀求知，以及追求自由與自治的精神。

參考文獻

1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23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9)：醫學教育的預備教育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2025；69(7)：72-6。
2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24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10)：台北高等學校成立及早期到日本讀大學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2025；69(8)：77-82。
3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25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11)：高等學校教育-官方/校方的方針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2025；69(9)：77-82。
4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26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12)：高等學校教育-熱誠閱讀及學習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2025；69(10)：81-6。
5. 台灣師範大學：臺北高等學校 1922-1949（台北高等學校的網站）。In Internet：
<http://archives.lib.ntnu.edu.tw/exhibitions/Taihoku/chronology.jsp>
6. 徐聖凱：日治時期台北高等學校之研究（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）。2009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，台北市。
7. 陳炯暉、陳振武、林桐龍等：日本舊制高等學校的回憶。2005；景福醫訊雜誌社，台北市。
8. 吳佳璇：葉英堃傳記-台灣精神醫療開拓者。2005；心靈工坊；台北市。
9. 津田勤子：明治日本與教育家三澤糾的思想形成脈絡。師大歷史學報 73：155-96。
10. 下村虎六郎。維基百科網站：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下村虎六郎>
11. 張文義（整理）、陳五福（口述）：回首來時路；陳五福醫師回憶錄。1996；吳三連基金會，台北市。
12. 曹永洋：噶瑪蘭的燭光；陳五福醫師傳。1993；前衛出版社，台北市。
13. In Internet：<https://www.google.com/search?日據時代高等學校的自由> ㊦